

东盟国家经受住了新冠疫情的考验

文/钟飞腾 田 珊

1月22日,泰国首先发现两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随后新加坡、越南也相继发现。2月2日,菲律宾出现首例死亡病例,由此揭开了东盟国家防控新冠疫情的序幕。但是到3月中旬以前,东盟国家主要以防控疫情输入为主,本地区尚未形成疫情大流行。

疫情的阶段性特点

东盟国家无论是确诊人数还是死亡病例。3月中下旬开始急速增长。3月15日,确诊人数首次突破1000人,4月1日突破一万人,两周时间增长了十倍。但从全球范围看,东盟十国确诊人数占世界比重始终处于较低水平,3月8日突破0.3%,3月22日上升至1.0%,此后至4月10日,这一比重呈相对下降的态势,疫情得以稳定。从4月中旬至6月初,东盟国家疫情大体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确诊人数增速趋于下降,相对于全球呈可控态势。截至4月底,东盟国家确诊病例达四万人,一个月内增长了四倍,6月6日这一数字突破了十万人。但是,相对于欧美地区确诊人数激增,东盟确诊人数占全球比重较低,且死亡病例占比长期维持在0.6%的水平。截至6月12日,东盟十国确诊人数为11.3万人,死亡病例3191人,分别占全球的1.5%和0.8%。尽管疫情仍在东盟有所蔓延,但相对于全球在疫情大暴发,总体上可控。



2020年4月21日,中国政府向东盟秘书处提供防疫物资捐赠仪式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东盟秘书处举行。

第二,分布不均衡。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东盟疫情进入僵持阶段,各国确诊人数发生更替,马来西亚从第一位下降至第四位,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占据前两位。截至6月12日,新加坡、印尼和菲律宾三国确诊人数分别为4万人、3.6万人和2.5万人,三国合计占东盟确诊总人数的89.1%。

第三,防疫方向有所变化。东盟早期主要以防范境外输入为主,到3月中下旬后转向应对本国和本地区的暴发,防控措施有明显的阶段性。3月9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菲律宾进入卫生紧急状态。3月10日,印尼因确诊人数激增而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防控政策。3月18日,马来西亚总理穆希

丁宣布落实行动管制令。3月26日,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原则上批准政府动用国家储备金,以应对国家“前所未有的危机”。同日,泰国实施《紧急状态法》,并关闭所有边境口岸。3月31日,老挝卫生部宣布将疫情防控等级调整为三级,前后两日出台政令关闭所有国家口岸及国家机关。由于前期的主要任务是防范境外输入,因而对国内居民的防疫措施总体上比较宽松。后期则有了很大改变,各国均采取了空前严厉的防控措施。

防疫措施成效显著

东南亚多数国家采取了遏制策略,主要通过边境封锁、加强隔离等

措施抗击疫情，同时积极采取财政预算倾斜、经济补贴、降息等短期措施应对对经济的冲击。从疫情防控效果来看，这些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

由于东盟各国对疫情的发展判断不尽相同，国情有所差别，各国防控措施也有较大差异。以新加坡和印尼为例，早期阶段两国管控较为松散，确诊人数以及死亡病例数增长较快。新加坡由于外籍劳工问题确诊病例呈现爆发式增长，印尼有2亿多人口，地区分布广，客观上增加了防疫难度，且政府对形势判断不准确。

截至6月12日，东盟国家中越南、缅甸、文莱、柬埔寨和老挝确诊人数均在500人以下。越南作为2020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在国际

交往中保持了较高的信息沟通能力，政府及时出台防疫措施，确诊人数较少。其他国家确诊人数较少与较低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关。多数中南半岛国家农业占比相对较高，城市化水平有限，人口密集程度较低，降低了疫情集中暴发的可能性。疫情期间，东南亚各国的中央政府权力普遍集中，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更加凸显了公共权威部门的重要性。东盟作为东南亚国家之间合作的重要平台，尽管体制较为松散，约束力有限，但依然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东盟国家疫情虽然总体可控，但国别分化较为突出，新加坡、印尼和菲律宾疫情仍相当严重，而其他国家纷纷采取放松管控

措施，加快复工复产。越南宣布于4月26日开始正式复工复产；泰国政府宣布于7月1日取消所有商业活动禁令，取消从3月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马来西亚从5月4日开始“有条件的放松”，6月10日开始实施“复苏式”行动管制；柬埔寨宣布于5月20日解除对六国公民禁止入境禁令，并于6月逐步恢复体育赛事；老挝政府5月29日表示放松部分防疫措施；新加坡则宣布自6月2日起进入疫情解封的第一阶段。不过，鉴于全球确诊人数已突破800万，东盟国家又处于全球交往的活跃地带，能否完全走出疫情仍需进一步观察。^[7]

（钟飞腾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

新冠疫情推动中国与东盟合作提速增质

文/张洁

中国与东盟毗邻而居，人员、贸易、投资的密切联系决定了联防联控疫情的必然性。4月14日，李克强总理在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上表示，从防控疫情角度讲，我们命运与共；从维护经济发展角度看，我们利益攸关。

中国是东盟开展抗疫合作的第一个对象国，双方的合作很快与中日韩合作、东盟—中日韩（10+3）合作形成“共振”，推动整个东亚地区实现守望相助、务实合作的良好态势，与混乱无序的全球抗疫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抗疫合作反映

出东盟仍然是中国外交中关系最稳定、合作基础最深厚的伙伴，10+3合作不仅为维护东亚和平、安全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会继续成为后疫情时代支持全球化与多边合作的中坚力量。

疫情冲击东盟议程

新冠疫情在东南亚的暴发与蔓延对东盟议程产生巨大冲击，这种影响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20年1月底到3月中旬，此时疫情尚未在东南亚地区暴发，鉴于新加坡、越南陆续发现确诊病例，大

多数东盟国家开始采取防控措施。2月14日，作为东盟轮值国主席的越南发表了《关于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的东盟主席声明》，此后疫情防控逐渐被纳入东盟工作议程。但整体来说，这一时期东盟各项活动仍按原计划进行，并未做出太多调整。

3月20日前后，疫情对东盟议程的影响进入第二阶段，出现了两件标志性事件。一是越南在3月19日宣布第36届东盟峰会将推迟到6月底召开，二是东盟几乎所有会议都改为视频会。根据东盟官网发布的年度日历，2~5月原定举行100多场会议，包括东盟内部各层级会议，东